

論中唐「詩人概念」與「詩人身分」

陳家煌*

〔摘要〕

唐代文人所使用的「詩人」這個辭彙，迥異於唐代以前的使用方式。「詩人」一詞創始自漢代，本專指《詩經》作者，但是自唐代以後，尤其是中唐以降，詩人逐漸成爲某種專力於詩歌之文人的代稱。從稱謂的轉變，可以看出唐代詩人群體逐漸形成社會所認可的階層，「詩人」亦成爲某一類特殊社會群體身分的代稱，也就是，從中唐以後，稱某人爲「詩人」，乃是一種美譽。本文從「唐代『詩人』概念的轉變」、「中唐詩人意識的成形」、「中唐的詩人認同」、「中唐時『詩人』成爲身分象徵」四個面向，來探討所謂「詩人」地位如何形成，而其「詩人身分」如何被世俗認可其價值。

關鍵詞：中唐、詩人、詩人意識、詩人自覺、詩人身分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所謂的「詩人」這個辭彙的使用，在唐代之前均指「詩經作者」，至唐朝時才開始用來指涉「詩歌創作者」，而在初、盛唐時，文章詩句中使用「詩人」一詞時，有可能是指「詩經作者」或「詩歌創作者」，但中唐之後，詩文中出現「詩人」一辭，則多意指「詩歌創作者」。本文即從唐朝「詩人概念」轉變的角度切入，探討「詩人」辭彙概念的轉變，與詩人身分的確立、詩人地位的興起之間的關係。中唐以後，文士開始以「詩人」一辭來稱美他人，或以「詩人」自詡，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唐所謂的「詩人」身分，逐漸受到世俗社會尊崇。文士以「詩人」自居，或被他人視為「詩人」，則能符合相應的世俗尊重。本文擬從「唐代『詩人』概念的轉變」、「中唐詩人意識的成形」、「中唐的詩人認同」、「中唐時『詩人』成為身分象徵」幾個面向，來探討所謂「詩人」地位如何形成，而其「詩人身分」如何被世俗認可其價值。

二、唐代「詩人」概念的轉變

在唐代之前，幾乎所有的文獻資料提及「詩人」一詞，均指《詩經》作者，鮮有例外，在十三經及先秦諸子等先秦典籍中，均不見「詩人」這個詞彙，而《史記》全書出現九次「詩人」，《漢書》則出現十四次。《史記》、《漢書》二書所出現的「詩人」一詞，毫無例外地均指《詩經》作者而言。¹不止《史記》、《漢書》如此，幾乎盛唐以前編纂的文獻或是詩文作品，凡是提及「詩人」一詞，均指涉為《詩經》作者，鮮有例外。六朝以前至唐代為止，以「詩人」一詞作為《詩經》作者專屬稱謂幾乎從未改變，「詩人」這個辭彙意涵的改變，逐漸轉化成為「寫詩之人」或「能詩之人」的詩歌作者，則肇始於唐朝，而大興於中、晚唐之後。

「詩人」這個辭彙，盛唐前專指《詩經》作者，因涉及儒家傳統經典，因此

¹ 據陳韻竹的研究成果提到：「以上《史記》與《漢書》總計23則用例中，除了《漢書·藝文志》引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一句仍然未知誰是所謂『詩人』，其餘凡稱作『詩人』者，都是指《詩經》三百篇作者，無一例外。」而在陳韻竹的接續論述中，他也認為揚雄所謂的「詩人之賦麗以則」之「詩人」一辭，亦是指《詩經》作者。陳韻竹：《論賦之緣起》（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9年），頁223-242。

在使用上，均以闡述《詩經》寫作時的意圖或寫作背景，如《史記》之用例，依陳韻竹之製表比較可知，如〈周本紀〉出現之「詩人」三例用法：「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此詩人即指《詩經·大雅》〈篤公劉〉篇作者；「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此詩人即指《詩經·大雅》〈文王有聲〉篇作者；「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此詩人即《詩經·小雅》〈采芣〉篇作者，《史記》及《漢書》於「詩人」一詞之用例法則均相同。²

本人翻索遼欽立輯校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發現，唐代以前詩作中所出現「詩人」一詞，僅有七例，而且全部用以指涉《詩經》作者，沒有例外，此七例本人製表如下：

	作者	詩句	詩題	遼欽立書之卷頁 ³	指涉《詩經》篇目
1	秦嘉	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瓊瓊	贈婦詩三首之三	漢詩卷6，頁187	衛風·〈木瓜〉
2	王祭	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	公議詩	魏詩卷2，頁360	小雅·〈湛露〉
3	曹植	鵲之疆疆，詩人取喻	白鵲詠	魏詩卷7，頁444	鄘風·〈鵲之奔奔〉
4	謝靈運	詩人陳條柯，亦有美攘別	種桑詩	宋詩卷2，頁1169	魏風·〈十畝之間〉
5	謝靈運	常嘆詩人言，式微何由往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八首·王祭	宋詩卷3，頁1182	邶風·〈式微〉
6	謝惠連	詩人詠踟躕，騷者歌離別	夜集歎乖詩	宋詩卷4，頁1197	邶風·〈靜女〉
7	王筠	結蘆同楚客，採艾異詩人	五日採拾詩	梁詩卷24，頁2017	王風·〈采芣〉

在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不止在《史記》或《漢書》中，詩人一詞全部指稱《詩經》作者，在唐以前的詩作中，亦無例外。在第六例與第七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詩人一詞的運用，有可能和屈原（楚客、騷者）相對出現。

若是翻閱兩《唐書》之前史書，或是劉勰《文心雕龍》全書與《昭明文選》，文句中所出現的「詩人」一詞，其用法亦全部指涉作為「詩經作者」，其文氣語脈也一定會論及《詩經》中單一詩篇，或是提及《詩經》作者之作詩初衷，或是提及《詩經》單一詩篇之風刺詩義。在唐代以前，只要論及「詩人」一詞，便與《詩經》有所連繫，並帶有尊崇儒家經典的意味。漢至六朝，有唐之前，僅有鍾嶸《詩

² 陳韻竹：《論賦之緣起》，頁233-242。

³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

品》評論陶潛時所提及「詩人」一詞可能不是指涉「詩經作者」，而是指詩歌寫作者。《詩品》一書提及「詩人」凡三見，現臚列於下：

（總序）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應璩）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焉，得「詩人」激刺之旨。

（陶潛）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⁴

這三段文字中所謂的「詩人之風」、「詩人激刺之旨」，觀其上下文脈，其「詩人」當指「《詩經》作者」，如〈總序〉文意中指自《詩經》以來諷詠傳統缺喪；而論應璩詩時乃評述應璩深得《詩經》中「以風刺上」之創作意圖。但是鍾嶸稱陶潛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似乎將「詩人」一詞脫離了專門指涉「詩經作者」的意涵，而賦予詩人詩歌創作者的身分，只是鍾鑠於此處以「詩人」指稱詩歌創作者，在唐代以前的文獻中，僅僅在此出現一次，實屬特例。⁵對於文學創作者，尤其是詩歌創作者，鍾嶸以「詞人」、「才子」、「風人」稱之：

（總序）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總序）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持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

⁴ 三段文字請參見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頁54、236、260。

⁵ 這個證據，在唐代以前，可能是唯一的特例，但是依其上下文句語脈及語境看來，這句「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實在顯得特別突兀，歷來論及《詩品》此則論述時，至明人閔文振的《蘭莊詩話》時方才提到「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一語，唐宋元三朝論及陶淵明，或批評陶詩時，均無徵引《詩品》這一句話。「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對陶淵明之人格與詩作的確是準確的評論，照理若唐、宋文論家讀到鍾嶸《詩品》中這句評語，理當應被唐宋文人大書特書，但是事實上卻沒有，而評語中出現《詩品》這一句話，始自明人。而且沈約作《宋書》時，才開始有隱逸傳，「隱逸」一詞是當時新興的辭彙，而鍾嶸時期「詩人」一詞除此之外，從未有文獻將這一個辭彙當成是身分用語，「隱逸詩人」二組辭彙的結合，照理應該不會在南朝梁時由鍾嶸提出，因此令人懷疑此句斷語是否為宋、明以後評語彙入《詩品》中之衍句。但自明代以來評論家對鍾嶸這則評語從無質疑，若有機會，本人當就此問題深入研究。

(總序)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
(謝惠連)〈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
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⁶

其實「詞人」或「辭人」乃是六朝最常用來指涉詩歌或辭賦作者之名詞，而鍾嶸以「風人」一詞稱許謝惠連，則指出謝惠連所寫之樂府詩，得《詩經·國風》之真髓。如《文心雕龍》中所提及之「詞(辭)人」數例，亦與現代觀念中之作家或作者概念相近：

	《文心雕龍》出現「詞(辭)人」一詞之原文	篇目	《文心雕龍義證》 ⁷ 原文出處頁碼
1	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迷其學，秦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	〈正緯第四〉	129
2	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辨騷第五〉	162
3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明詩第六〉	185
4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循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播其風，王、揚聘其勢，泉、朔已下，品物畢圖。	〈詮賦第八〉	280
5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	〈定勢第三十〉	1134
6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	〈情采第三十一〉	1158
7	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諷刺道喪，故興義銷亡。	〈比興第三十六〉	1356

⁶ 以上四段文字，分別見於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頁77、103、111、277。

⁷ [梁]劉勰著，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8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	〈指瑕第四十一〉	1545
9	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	〈時序第四十五〉	1667
10	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時序第四十五〉	1677
11	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物色第四十六〉	1741
12	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	〈物色第四十六〉	1758
13	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之人，類不護細行。	〈程器第四十九〉	1869
14	「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鞏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序志第五十〉	1911

以上所臚列《文心雕龍》中含「辭人」或「詞人」共 14 例，由這些例子中可以得知，在劉勰的觀念中，乃是將「有韻之文」與「無韻之筆」的作者，合稱為「詞（辭）人」，並且在行文上，經常與《詩經》作者之「詩人」對稱，意思類同現代觀念之「作家」。由此亦可知，在南北朝時，現今觀念中寫詩之詩人身分，尚未獨立，但因揚雄《法言·吾子》篇「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的影響，劉勰在行文使用「詞（辭）人」一詞時，偶爾含有貶意，反襯出以「詩人」一詞尊稱地位崇高的《詩經》作者，全書體例如一，從未改變，而這也完全符合唐代之前「詩人」這個詞彙的慣用法則。

從上述例子中，吾人可得知，魏晉六朝雖稱為文學自覺之時代，但是文士在提及寫詩之作者時，並不以「詩人」稱呼之，就算是文論家，例如以專門評述詩、文作者之鍾嶸與劉勰，於「詩人」一詞的使用上亦有特定的指涉。在魏晉六朝五言詩大量成為文士創作體裁時，鍾嶸以「詞人」、「才子」指稱這些詩歌的創作者，劉勰則傾向將「詩」、「文」作者合流，以「詞人」或「辭人」合稱之。若論及「詩人」一詞時，魏晉以降，至唐以前，幾乎全部指稱《詩經》作者，而僅有鍾嶸稱陶淵明為「古今詩人隱逸之宗」是唯一的例外。由此可知，詩歌的寫作雖然成為一般文士的文學技能，也成為文士炫才的主要途徑之一。但是，當時一般人卻將

寫詩之人視為「詞人」或「才子」，並未將這些人視為特定的群體，甚至在評論詩、文時，亦專就文章作品本身來討論，鮮少採用某種身分辭彙來稱美作者。

但是到了唐代，詩歌的創作才華成了大量文士階層炫才的主要工具，某些在仕途不如意的士人，亦能藉由創作優美的詩歌，得到相當程度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聲望，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詩人們彼此以「詩人」、「詩客」、「詞客」等辭彙自我標榜或稱美他人，似乎有意識地形成詩人群體，並以詩人身分自居。

如果我們以「詩人」一詞為關鍵字檢索《全唐詩》，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在初、盛唐的詩作中，「詩人」一詞的使用頻率出奇地低，但是在孟浩然、李白等人的用例中，「詩人」一詞已不專指《詩經》作者，而已經逐漸用來稱呼詩作作者了，在初唐和盛唐，於詩中以「詩人」指涉詩歌作者，大約有五例：

許敬宗（592-672）：「菊花應未滿，請待詩人開」

孟浩然（689-740）：「秋入詩人意，巴歌和者稀」

李白（701-762）：「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廓」

李嘉佑（盛唐時人）：「詩人饒楚思，淮上及春歸」⁸

盛唐之前詩句中出現「詩人」一詞，除了以上所引五例指稱為詩歌創作者外，尚有張九齡「詩人何所詠，尚父欲鷹揚」（49：600）、儲光羲「胡馬悲雨雪，詩人歌旆旌」（137：1393）、蕭穎士「詩人有言，好是正直」（154：1593）、李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179：1826）、杜甫「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217：2279）等五例，而這五例依判斷，詩句中所謂的「詩人」，均指「《詩經》作者」而言。因此，初、盛唐詩句中所出現「詩人」一詞，開始不拘限於專指《詩經》作者，也有相當比例指涉詩歌創作者。

但是，自中唐以後，唐人詩句中出現「詩人」一詞，有很大的比例都是指涉「詩歌創作者」，如韋應物（737?-791?）於全部詩作中使用了三次「詩人」，分別是「釋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186：1899）、「詩人感時節，行道當憂煩」（189：1840）、「朝與詩人賞，夜攜禪客入」（193：1994），在這三例中均指詩歌創作者，而第一例與第三例，「詩人」的用法分別與「釋子」、「禪客」相對，可見韋應物已不將「詩人」專指為《詩經》作者，在詞彙的使用上，已經視「詩人」與釋子、

⁸ 以上五例分見《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60年），卷35，頁467；卷160，頁1645；卷175，頁1791；卷179，頁1831；卷206，頁2151。以下所引唐人詩例，除少數例句外，均出自《全唐詩》，引詩亦僅標出（卷：頁），不另作註腳，全文體例如一。

禪客一般，為某種身分的稱謂。關於「詩人」自中唐後成為某種社會地位與身分的代稱，本文將於第四小節多所論述。

「詩人」這一辭彙，初、盛唐如前段論述所見，於《全唐詩》共出現 10 例，若統計詩題與詩句中出現「詩人」一詞的比例，中唐 67 例中，僅有 5 例指涉為《詩經》作者，有 62 例為詩歌創作者；晚唐 45 例中也僅有 5 例指涉為《詩經》作者。由此可知，「詩人」一詞從中唐以後，不止在詩題詩句中被大量使用，另外，也漸漸從兩漢以降至六朝專指《詩經》作者的內涵，轉化為指稱詩歌創作者，從辭彙內涵所指涉的意義變化，亦可見詩歌創作者地位的提升，由原來專稱《詩經》作者的辭彙，轉變成寫作詩歌的文人。

唐代社會崇尚文學，龔鵬程將唐朝士人以詩文鬻名、博取社會名望的現象，以「文學崇拜」一詞涵攝之，⁹能詩之文人，於社會亦享有相當聲譽，因此唐人寫詩，除了中唐以降用「詩人」一詞來推尊延譽詩歌創作者，在詩題或詩句中，亦以「詞人」、「詞客」、「辭人」、「辭客」、「詩客」、「才子」等詞彙來尊美詩歌創作者，只是以上這些詞彙的使用，觀其上下文脈及語意，其尊貴性均不如「詩人」一詞。如杜甫於詩句中未曾以「詩人」稱呼他人，但卻於詩句中以「詞人」用來代稱詩歌創作者，如杜甫〈洗兵馬〉一詩提到：「隱士（謂李泌，時求歸衡山）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時楊炎輩爭獻靈武受命、鳳翔出師頌之類。）」（217：2279）、〈送陵州路使君赴任〉「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227：2468）、〈白鹽山〉「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229：2505），這三例可見杜甫以「詞人」一詞彙來指涉詩歌創作者，但杜甫在〈詠懷古跡五首〉之一「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詩句中，亦以「詞客」來代稱擅長詩文的庾信，但遍查杜詩，杜甫並不以「詩人」來稱詩歌創作者。由杜詩之例證，可知在盛唐時，「詩人」並不是一般文人慣用指涉詩歌創作者的通用詞彙。而且初、盛唐時人寫詩，亦如魏晉南北朝詩人，鮮少於詩句提及詩歌創作者創作態度或指出他者、自我之詩人身分，不止鮮少用「詩人」來指稱寫詩之人，連「詞人」、「詞客」、「辭人」、「辭客」、「詩客」、「才子」等具身分指稱的用詞甚少在詩中出現。「詩人」、「詞人」、「詞客」、「辭人」、「辭客」、「詩客」、「才子」大量於詩句中出現，以特定辭彙來標舉詩人身分的觀念與寫法，乃是大興於中、晚唐。關於這點，中唐前之「詩人」，大多專指《詩經》

⁹ 龔鵬程：〈文學崇拜與中國社會：以唐代為例〉，《文化符號學》（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初版），頁307-401。

作者，約與「風人」相當，若稱呼在詩作上有專才之人，則以「詞人」、「詞客」、「騷人」稱之，中唐以後，雖也有以「詩人」作為《詩經》作者之代稱，但是已不是《詩經》作者之專屬稱謂了，反而逐漸轉變為指涉專精於詩藝之人。由「詩人」所指涉對象的轉變，亦可知有唐一代「詩人」地位之昇降變化過程。

三、中唐詩人意識的成形

若翻查遼欽立所編集唐以前的現存詩歌總集《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一書，我們可以發現，在唐代以前士人寫詩時，甚少視自身為詩人或視他人為詩人，不論是詩中所呈現的外在事物的描寫，或是作者內心感慨的抒發，創作者均以客觀的態度觀察後，以文字加以記錄成詩作。「身為詩人」或「視他人為詩人」的意識，在六朝之前，創作者尚未有所自覺，或是以此身分來自我標榜。就算是六朝時代詩文評論專著：《詩品》與《文心雕龍》，在評述作品時，創作者的身分或定位，經常是曖昧或是模糊不清的表述。例如東晉時擺脫官員身分、最終以隱士身分躬耕柴桑之陶淵明，除了農夫身分之外，大量地寫作詩篇以吟詠田家景致，不難令人聯想陶淵明亦是自覺地以詩人自居。不過在他的詩中，幾乎完全看不到陶淵明以詩人（或詩歌創作者）的身分自詡。但如下引之〈移居詩二首〉似乎可隱約得見陶淵明之創作意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¹⁰

在這兩首詩中，陶淵明有稍微明確地提及他創作的背景，「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與「登高賦新詩」，或許可以勉強稱為自身對閑暇時歌詠的描寫與對作品的彼此討論，但就詩人創作意圖及創作目的而言，畢竟不甚明確。而且在陶詩中此類

¹⁰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993-994。

提及創作之詩作，仍然鮮少，就算陶淵明在〈詠貧士七首〉之六以張仲蔚自比，寫詩的技能也不是陶淵明自詡比況的重點：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¹¹

當然，此詩中張仲蔚受陶淵明欽佩效法之處，乃在仲蔚能安於窮困，雖不為他人知賞，亦不與俗世同流。詩句中的「賦詩頗能工」，亦僅是附帶一提張仲蔚之詩藝以自況。工於詩賦的才華，並不是陶淵明歌詠張仲蔚以自我期許比附的主要原因。

當然，陶淵明也曾在詩中提到寫詩動機，如〈乞食詩〉所寫：「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¹²，但這類的詩句，在陶詩中亦是少數，而且也並沒展現出身為創作者的姿態。以身分而論，陶淵明詩人身分的純粹性比漢魏六朝中所有的詩人都來得高，而他亦不以詩人自居自詡，遑論其他擁有官員身分的詩人們。大抵上，在唐代以前，整個魏晉六朝時人寫詩，大概鮮少有人以身為詩人的姿態自居，但是到了中唐以後，在詩中自稱自己為詩人，或是稱許他人為詩人的詩作與詩句，便日漸增加。簡言之，也就是自中唐以後，詩歌創作者以在詩中標榜自我及他人詩歌創作者的身分，藉以擡高自身及他人的地位與價值。

在初、盛唐時在詩句中明確指涉他人身分為創作者的辭彙，依比例而言，乃是「才子」，以「才子」這個辭彙指涉詩歌創作者，亦即將重點聚焦在對方的才華上。「才子」一詞在唐詩的使用上，共有 195 例，遠超過「詩人」的 122 例，而且大部分均指有文學才華的文學創作者，僅有少數例子不免與年少得志的賈誼相連結，「洛陽才子」在唐代詩句的使用上，乃是專門的詞彙，引用賈誼典故以稱美他人。例如王維詩作中雖然沒有在任何詩句中提及「詩人」一詞，但是他以「才子」稱美他人的詩句，卻有五例：〈同崔傅答賢弟〉「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125：1258）、〈送孫二〉「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人」（126：1273）、〈河南嚴尹弟見宿弊廬訪別人賦十韻〉「貧交世情外，才子古人中」（127：1291）、〈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為之贈〉「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為郎典石渠」

¹¹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009。

¹²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992-993。

(128:1296)〈送楊少府貶郴州〉「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128:1297)，從王維「才子」的用例來看，才子一詞經常與賈誼相關連。除王維外，盛唐詩人如孟浩然(四例)、李白(一例)、岑參(四例)、杜甫(三例)、李嘉佑在詩句使用「才子」時，亦或多或少指涉賈誼，但比例均不算高，而大曆十才子之一的錢起，竟然在詩中使用了高達十四次的「才子」一詞，並且在〈送韋信愛子歸覲〉「才子學詩趨露冕，棠花含笑待斑衣」(239:2669)、〈寄永嘉王十二〉「永嘉風景入新年，才子詩成定可憐」(239:2672)兩組詩句中，明確地將「才子」與「詩」聯繫。中唐時期劉禹錫在使用「才子」的十二例中，除了將「才子」指涉為有文章才華的士子外，亦將「才子」與寫詩行為繫聯，如〈送景玄師東歸〉「東林寺裏一沙彌，心愛當時才子詩」(359:4049)、〈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心知洛下閒才子，不作詩魔即酒顛」(360:4060)、〈福先寺雪中酬別樂天〉「才子從今一分散，便將詩詠向吳儂」、〈重送鴻舉師赴江陵謁馬逢侍御〉「茂陵才子江陵住，乞取新詩合掌看」(365:4115)。在這四例中，有二例是稱美白居易之詩人身分，而劉禹錫在二處「詩人」用例中，則明確地以「詩人」作為詩歌作者的專稱：〈秋日題寶員外崇德里新居〉「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間」(359:4053)、〈酬皇甫十少尹暮秋久雨喜晴有懷見示〉「雨餘獨坐卷簾帷，便得詩人喜霽詩」(361:4080)，由此可知，劉禹錫除了以「才子」稱美他人外，在使用「才子」一詞時所指涉的文學才能多指詩歌上的才華。另外，從上引詩句亦可知劉禹錫將「詩人」視為某種特殊身分之人，將「詩人」身分從文士詞客中脫離出來。

同樣地，在中唐時期不止劉禹錫，當時詩壇上享有名望的詩人們，他們在詩句中所稱之「詩人」已經幾乎全部指涉為寫詩、能詩之人：

孟郊：〈招文士飲〉「文士莫辭酒，詩人命屬花」(375:4210)、〈嚴河南〉「詩人偶寄耳，聽苦心多端」(377:4230)、〈送淡公〉「詩人苦為詩，不如脫空飛」(379:4254)、〈哭劉言史〉「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381:4276)、〈弔盧殷十首之一〉「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381:4277)。

張籍：〈贈太常王建藤杖筍鞋〉「稱與詩人用，堪隨禮寺齋」(384:4320)。

韓愈：〈送僧澄觀〉「人言澄觀乃詩人，一座競吟詩句新」(342:3831)、〈和席八(夔)十二韻〉「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344:3853)。

白居易：〈馬上作〉「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醅」(431:4576)、〈讀鄧魴詩〉「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433:4781)、〈題盧祕書夏日新栽竹二十韻〉「撐撥詩人興，勾牽酒客歡」(438:4861)、〈聽水部吳員外新詩因贈絕句〉「明朝說與詩人道，

水部如今不姓何」(438:4867)、〈李白墓〉「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440:4905)、〈畫木蓮花圖寄元郎中〉「唯有詩人能解愛，丹青寫出與君看」(441:4918)、〈新秋喜涼〉「光陰與時節，先感是詩人」(455:5152)、〈送兗州崔大夫駙馬赴鎮〉「戚里誇爲賢駙馬，儒家認作好詩人」(455:5153)、〈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之一〉「且喜詩人重管領，遙飛一醞賀江山」(455:5157)、〈和河南鄭尹新歲對雪〉「銅街金谷春知否，又有詩人作尹來」(462:5256)。

姚合：〈送崔約下第歸揚州〉「滿座詩人吟送酒，離城此合亦應稀」(496:5617)、〈送韓湘赴江西從事〉「行裝有兵器，祖席盡詩人」(496:5627)、〈遊春十二首之六〉「併起詩人思，還應費筆毫」(498:5664)、〈杏溪十首之八 渚上竹〉「詩人月下吟，月墮吟不休」(499:5674)、〈陝下厲玄侍御宅五題之三 吟詩島〉「幽島蘚層層，詩人日日登」(499:5675)、〈題崔駙馬宅〉「詩人多說離君宅，不得青苔地上行」(499:5680)、〈晦日宴劉值錄事宅〉「花落鶯飛深院靜，滿堂賓客盡詩人」(500:5688)、〈答韓湘〉「詩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501:5703)。

從這些例句我們可以得知，中唐詩人，逐漸將「詩人」視爲一種身分。韓愈詩句中將僧人澄觀稱之爲詩人，可見韓愈認爲澄觀於當時人觀念兼有僧侶與詩人雙重身分；孟郊詩中將「文士」與「詩人」兩者分別兩寫，而白居易與姚合於詩句中亦大量使用「詩人」這個辭彙，用來指稱某種概念上的詩人群體或詩人階層。白居易甚至以「詩人作尹」、「詩人管領江山」，將「詩人身分」與「官員身分」兩相揉合，並認爲詩人身分可以爲官員身分添光。

在唐代詩人意識逐漸興起，可以從中唐文人大量以「詩客」、「詞人」、「詩人」自稱或稱呼他人現象加以證明。視他人爲詩人，並自居爲詩人，則呈現出某種詩人自覺，興起自己或與自己志同道合之人均爲詩人之意識，並藉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博得社會聲名。中唐時期詩人意識的興起，使得六朝以降，除婚宦、世家大姓之外，另一種以寫詩才能受社會肯定的重要條件。

四、中唐的詩人認同

詩人身分之自我認同，最明顯之處，便是詩人們引前輩詩人以自比。如介於中唐、晚唐之詩人張祜，便以盛唐前輩詩人孟浩然、李白等人自比，他在〈感歸〉詩寫道：「行卻江南路幾千，歸來不把一文錢。鄉人笑我窮寒鬼，還似襄陽孟浩然。」

¹³雖然無錢財富貴，但是張祜亦是以處境才華類似孟浩然般的詩人而自豪。在感慨身世蹇薄不達時，張祜亦寄詩給劉禹錫：「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¹⁴，以賀知章稱許李白為謫仙人，使李白得享大名，讓玄宗賜李白翰林供奉職的故事為喻，反襯出令狐楚薦己於穆宗事竟不成。張祜在此詩中反用典故，並自喻才華似李白，亦以孟浩然一生無官，來比喻自身處境。一聯之中，自比為李白、孟浩然，並且使用的是當時唐代今典，除了感嘆之外，也頗以自身行跡肖似李、孟二人而自豪，在此張祜自然是認同自身之詩人身分。

張祜畢竟是中唐、晚唐之交的詩人，在張祜前，雖有文人如孟郊、白居易等人自許為詩人，但是幾乎鮮少文人能像張祜一般，直接以詩人「自我比況」，但是中唐文人卻經常以暗喻方式將自身與詩人相提並論之傾向，如韓愈於〈石鼓歌〉中提到：「張生（籍）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340：3381），韓愈雖然口中說自己「才薄」，無法上及李、杜的詩才，但是韓愈還是寫了〈石鼓歌〉。這四句詩句言外之意，就是韓愈自認為自己雖才薄，但是卻是李、杜以降，於中唐當代最適宜寫石鼓歌之人，亦即，韓愈於此是自認以繼承李、杜詩才之詩人自居。

當然，李、杜二人之詩集，幾乎是整個中唐詩人所必讀的典範，李、杜於詩史上之地位，也是在中唐時確立的，元、白、韓等人均從各方面確立及發揚李、杜詩的價值，¹⁵而韓愈更是在〈醉留東野〉一詩中，強烈表現出他對李杜的景仰之意：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駟螭。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我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340：3807）

¹³ 張祜撰，尹占華校注：《張祜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卷4，頁201。

¹⁴ 張祜：〈寓懷寄蘇州劉郎中〉，《張祜詩集校注》，卷8，頁347。

¹⁵ 中唐相關文章的論述，參見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56，頁600-602；白居易：〈與元九書〉，《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45，頁961-962。李杜（尤其是杜甫的地位）地位的確定，此二文實有功勞，但此二文又牽涉到李杜優劣問題，則非本文所能詳述。韓愈亦有「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之大家熟知的句子，見韓愈〈調張籍〉（340：3814）。

韓愈孤傲自負，¹⁶對人少許可，但此詩對於孟郊卻由衷地敬佩，甚至將孟郊與李、杜相提並論。當然，「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身既年老，亦無官職，可說在當時主流之世俗價值上，孟東野沒什麼值得誇耀之處，但是韓愈卻認為自己依附於孟郊，就如「青蒿倚長松」，並認為自身追求官位是一種「姦黠」的行為：也就是，對自我「是否為詩人」的身分認定及實際作為上，韓愈認為孟郊是純粹的，而自己是姦黠駁雜的，也就是韓愈自我認定並非純粹詩人，¹⁷因此在面對擁有純粹詩人身分的孟郊時，韓愈便形氣沮，而表現出想跟隨的意願。雲龍之喻，亦是在「詩領域」中所做的比喻，龍為主、雲為輔，亦是以詩之成就而論，韓愈願輔佐孟郊以追隨其詩人身分。韓愈認可孟郊之詩人身分，並承認自身不如孟郊之處乃在身為詩人的這件事上，驕傲的韓愈清楚地點明孟郊身為「詩人」之價值。¹⁸

除了以詩人自喻突顯自我詩人身分外，當詩人身分或做詩行為，與世俗其他身分相衝突時，詩人的抉擇，便更能表現出個體是否以詩人自居，例如前文曾引到的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中有一段很生動的記載：

及其為詩，劇目鉞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搯，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¹⁹

孟郊因為「大翫於詞」而終於「與世抹搯」，不得世俗名位，而人所劫劫用心之處，乃在功名利祿，以此相視孟郊之鉞心為詩而不從流俗追求名利，孟郊當然心有餘力於詩藝上。而他人以「後時」的說法規勸孟郊求取功名，孟郊反駁自己雖有才

¹⁶ 韓愈孤傲的個性，可從〈答呂鑿山人書〉一文中可見端倪。文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3，頁216-218。

¹⁷ 事實上，韓愈的身分認同，並非認定自己主要社會身分為詩人，如韓愈曾在詩中寫道「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但這是因為當時韓愈擔任中書舍人知制誥，以撰寫告身而言，詩人身分乃為餘事。詩見韓愈：〈和席八夔十二韻〉（344：3853）。韓愈熱中於當官的意願還是很強烈，在詩人認同的程度上，韓愈想當古文家，或是自居為廣正文人的念頭，但可貴的是，韓愈卻能賞識及包容許多詩人，不論是孟郊、張籍、李賀、元稹等，都曾經由韓愈的吹噓揚譽，而得到時人的尊重。

¹⁸ 關於孟郊詩人形象與詩人意識的研究，鍾曉峰有深入而精闢的見解。參見鍾曉峰：〈論孟郊的詩人意識與自我表述〉，《淡江中文學報》，第20期，2009年6月，頁190-211。

¹⁹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韓昌黎文集校注》，卷6，頁445。

華追求世俗權位，自己決定將此種才能與機會排「擠」出而給「與」他人，亦表明自身將戮力專心於詩歌寫作。故馬其昶於此段下引何焯曰：「是我所棄以讓人者，不足爭先也。」²⁰他人所重視之世俗身分乃官吏身分，孟郊不認為自身缺乏足夠的才華以爭取高官厚祿，而是自我選擇放棄了這種才能與機會而專注於詩藝上，故對孟郊而言，官吏身分乃「不足爭」，那孟郊所謂能爭者，自身才能才華值得發揮之處，乃在詩作也。

以上闡述了許多韓愈對孟郊之詩人身分的認同，那麼孟郊是如何看待自己之詩人身分呢？其實由孟郊所寫的〈勸善吟〉一詩，便可完全證明孟郊認同自己之社會身分為詩人：

瘦郭有志氣，相衰老龍鍾。勸我少吟詩，俗窄難爾容。一口百味別，況在醉會中。四座正當喧，片言何由通。顧余昧時調，居止多疏慵。見書眼始開，聞樂耳不聰。視聽互相隔，一身且莫同。天疾難自醫，詩癖將何攻？見君如見書，語善千萬重。自悲咄咄感，變作煩惱翁。煩惱不可欺，古劍澀亦雄。（373：4189）

這首詩的詩題下有注：「醉會中贈郭行餘」。在面對郭行餘「少吟詩」之勸後，孟郊寫了這首詩回覆郭行餘。郭行餘勸孟郊少吟詩的原因是孟詩難容於俗，難容俗之詩作，便不會被流俗所喜，亦得不到相應的聲名。當然，由詩所得到的俗世聲名乃是為了有利於仕宦上的順遂。但是孟郊卻以「天疾」、「詩癖」來解釋自己好吟詩的行為。作詩，是不由自主的自我表現，若不作詩，孟郊身為孟郊之個人價值將蕩然無存，孟郊也就不成爲孟郊。因此孟郊在詩中將「仕宦」與「寫詩」以「視」、「聽」兩種感官作比喻，得出「視聽互相隔，一身且莫同」的結論，²¹也就是就算孟郊處於「昧時調」、「俗窄難容」的處境，孟郊亦不會放棄作詩。當然，

²⁰ 同上註，頁446。

²¹ 在此筆者並非過度詮釋，因為孟郊在詩中坦承自己「昧時調」，亦即自身無法投身於世俗主流價值，亦即官宦身分的追求，「居止多疏慵」亦是不強求官吏身分，而得出的詩人自然舉措。但不強求並不同於不欲求，若能任官，孟郊還是會盡全力取得官員身分，希望位居高位，但若詩、仕有所衝突時，必須做出抉擇時，孟郊的抉擇亦很明確。故此詩以讀書喻寫詩（因為寫詩必與讀書相關），以聽樂喻仕宦（仕宦必有宴樂，宴會場合中必有樂隊或歌妓），所以書、樂之別，恰以比喻任人、詩人雙重身分之互斥。

在創作詩歌的過程自然是辛苦莫比的勞心行爲，而寫詩也不見得能得到世俗聲名，因此孟郊於〈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詩便有所感慨：

詩人苦為詩，不如脫空飛。一生空鷲氣，非諫復非譏。脫枯挂寒枝，棄如一唾微。一步一步乞，一片一片衣。倚詩為活計，從古無多肥。詩饑老不怨，勞師淚霏霏。（379：4254）

孟郊於此將寫詩吟詩比喻爲雉鳥的叫聲（鷲氣），那詩人也就像鳥一般，只是鳥自然地脫空而飛，顯得輕鬆自在，而詩人卻是被作詩這件事所勞心苦智。此詩末四句，寫出孟郊自知無法從寫詩得到實質的利益，不能以詩謀生，但就算是因寫詩而落入「饑」的地步，孟郊亦是老而無怨尤。「一步一步乞，一片一片衣」寫的是詩句創作過程，步吟成句，而詩作的成型就靠片段思緒來綴補成篇，如同合成片片布帛來縫製成衣一般的辛苦。此詩寫出了孟郊自居爲詩人身分，清楚地認清身爲詩人的苦楚卻無怨悔的心態。

孟郊對自我詩人身分有自覺亦有堅持，在面對自己同輩詩人或晚輩詩人時，孟郊亦有認同其詩人身分之傾向，如〈贈蘇州韋郎中使君〉一詩便表示對詩人前輩韋應物之認同、〈戲贈無本〉便表示對晚輩賈島的認同：

謝客吟一聲，霜落群聽清。文含元氣柔，鼓動萬物輕。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塵埃徐庾詞，金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鮮明。萍蘋一浪草，菰蒲片池榮。曾是康樂詠，如今奪其英。顧惟菲薄質，亦願將此并。
〈贈蘇州韋郎中使君〉（381：4276）

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瘦僧臥冰凌，嘲詠含金痍。金痍非戰痕，峭病方在茲。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有時踉蹌行，人驚鶴阿師。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戲贈無本〉（381：4277）

謝客乃謝靈運，孟郊以謝靈運比況韋應物，此詩前十句都是在讚美韋應物的詩作，尤其是「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乃是指韋應物詩作如同其人品性格一般，端正清方，不曲折枝蔓，故以嘉木作喻。詩中除以謝客喻韋外，另外還以曹植、劉楨這兩個《詩品》中被評定爲上品之詩人來讚美韋應物，並在詩末寫出孟郊想跟韋應物並肩看齊之意；而〈戲贈無本〉則又是對後輩詩人之認同，先寫無本（後

還俗爲賈島)爲了寫詩過分吟詠而口成瘡痍之事。無本爲詩不惜犧牲身體,使得孟郊感佩,故有「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之句,以無本對詩之專注犧牲,讓當代二位詩人自嘆不如,以此來抬高無本的詩人身分,並以李杜二詩人不見此狂癡作結,亦遙想李杜二詩人之意見應與孟韓二人相同也。

自身以詩人自居後,之所以能擺脫功名利祿的誘惑而勤於作詩,作詩所得到的成就感,孟郊亦曾有詩作描述: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聖賢心,孰與造化該。勉矣鄭夫子,驪珠今始胎。〈贈鄭夫子魴〉(377:4234)

在此詩中,孟郊指出了詩人能裁剪並重新組合天地意象之創造力,而將此種文學創造力向上提升到與聖賢、造化並比。此詩當然是另一種形式的詩人自覺宣告,孟郊於此詩中展現了屬於詩人(文學家)十足的自信。

孟郊雖然意識到身爲詩人之獨特性與價值,但是他也同樣理解詩人的成功乃是在詩(文學)領域,而非世俗認可的價值上,因此,他也会感慨詩人之遭遇,如〈哭劉言史〉詩的「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笑,累累其奈何」(381:4276)、〈弔盧殷〉詩的「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白雲既無主,飛出意等閒」(381:4277),詩中所謂的詩人多餓死,當然是文學修辭上的誇飾法,但是對於詩人運途多舛的處境,孟郊也深感哀傷。²²

以上所引孟郊以詩人自居之詩人意識強烈而明確,並且能以詩人的角度對待他所認可的詩人,不論是前輩詩人或是晚輩詩人。同樣地,白居易亦有明確的詩人意識,並在左遷江州後,逐漸以詩人的身分自居,將人生價值建立在詩領域上²³,

²² 鍾曉峰認為:「孟郊也藉由盧殷、劉言史的窮餓以卒,自覺體認到詩人的特質與命運。這種表現,與白居易用正向、肯定態度去建構詩人自我之意識相較,孟郊明顯傾向於以悲壯、否定又帶有執著精神來強化自己作為詩人之身份與創作。」參見鍾曉峰:〈論孟郊的詩人意識與自我表述〉,頁211。

²³ 陳家煌曾觀察白居易如何以詩人身分自居,並發展出詩人意識,另外以詩人自居後詩中所呈現何種詩人形象立論,確立白居易為有唐一代詩人意識最明確的一位詩人。陳家煌將白居易此種現象稱之為「詩人自覺」。詳見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

這當中，白居易也在〈與元九書〉中提出他所認可的詩人：

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迺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²⁴

引況詩人偃蹇命簿，文章中所出現陳子昂以降至張籍，此六人均是白居易認可之唐朝詩人，而且孟郊與張籍與白居易還是同輩時人。雖然白居易自謙「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但援引此六詩人為自己同人，並將自己之身分定位為詩人的意圖非常明顯，由此文而言，白居易亦自居為詩人，自認其身分為詩人，故以「詩人多蹇」來解釋自己無辜左遷江州的原因與自我安慰。

當詩人以詩人自居後，便以能吟詠詩歌、評斷詩歌自負，如李賀〈巴童答〉一詩，便是將自己所刻意塑造與自我認同的詩人形象而藉巴童之口道出：

巨鼻宜山褐，龐眉入苦吟。非君唱樂府，誰識怨秋深。〈巴童答〉（392：4414）

李賀認為自己創作樂府詩，以詩人苦吟之態度，讓人瞭解秋怨之深。當然，每個人都有秋怨秋愁，只是真正能以語言道出人人所知卻難以表達的微妙情感的人，只有詩人，而李賀，正藉巴童之口，向世人宣示自己就是那個詩人。因此當李賀〈高軒過〉一詩中稱讚韓愈、皇甫湜：「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393：4430）時，基本上也是李賀的自我期許。因為李賀瞭解到詩人價值所在，因此他的生活，就幾乎完全以寫詩過活，如李商隱於〈李賀小傳〉中提到的：

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

²⁴ 白居易：〈與元九書〉，《白居易集》，卷45，頁964。

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²⁵

此段值得注意地，除了李賀嚴謹努力的創作態度外，「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一句更值得大書特書。李商隱用這段話來表現李賀不寫作應酬詩，亦不似他人寫作「程限為意」的限題限韻詩，用來誇耀詩才藉以得名，或是以詩作應酬來討好有力人士。對李賀來說，詩並非拿來交際應酬的工具。以創作態度而論，李賀的嚴肅自持的創作態度，使得李賀成為中唐最純粹的詩人。雖然他只活了廿七歲，卻在詩藝上卓然有成，這要歸功於李賀強烈地以詩人自居，重視自身的詩人身分，並且有明確的詩人自覺，並以嚴肅的態度面對寫詩這件事。

當然，在文士功名未顯，或位卑官淪下位時，亦有可能以詩人自居，展現出吟詩傲誕的行為，如權德輿〈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中記載即將赴任的當塗縣尉馬少府，在還沒有得到官職之前的舉止：

時生窮閭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敝，詩思不詘，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豪游曠貴者，敖如也。²⁶

以詩思不詘稱美對方，並在文中提到「雖然，郡齋言詩，幕廷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²⁷亦鼓勵此縣尉能在宣州府中，能陪宴賦詩、擊畫獻策，能有所作為，並發揮其詩人才華。在還未選官前，以詩人身分自居，所展現的行為態度便是「視豪游曠貴者，敖如也」，亦即自身所擁有之詩才，在面對權勢富貴時，依然傲立不為對方之社會身分所屈，以詩人之身分傲視他人。

在中唐時，除了孟郊外，最明確地以詩人自居並以詩人自豪的詩人，便是白居易，白居易於元和十年（815）四十五歲任江州司馬時，第一次將自己的詩作編纂成十五卷詩集，因而寫了〈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一詩：

²⁵ 李商隱：〈李賀小傳〉，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780，頁8149。

²⁶ 權德輿：〈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全唐文》，卷491，頁5021-5022。

²⁷ 同上註，頁5022。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初成。²⁸

此詩頷聯有白居易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李二十常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因此所謂的「偷格律」、「伏歌行」自是指元稹與李紳心服於白居易詩之事，這也是詩題中有「戲贈」的原因。此詩白居易先提到自己得意的詩作〈長恨歌〉與〈秦中吟〉，以詩作自豪後，接著再以「身後文章合有名」來展現自己於文學上的自信。世間富貴與身後文章相對，亦即彰顯社會主流價值所認同的權勢富貴之流的官吏身分，白居易自認在詩人身分之下。白居易追求的身後之名，乃建立在文章詩歌上，而非世間富貴之上。

五、中唐時「詩人」成為身分象徵

有唐一代，最明確地將「詩人」視為某一種身分來指稱他人例證，乃是柳宗元（773-819）的〈送詩人廖有方序〉一文，直接稱呼廖有方為「詩人」：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²⁹

此序以交州偏遠，雖出產奇物，卻因文風不盛而鮮少奇人。文中以廖有方之詩作與交州出產之南金珠璣等物相提並論，固因廖有方為交州人，³⁰柳宗元以交州物產匹美廖有方之詩作，但一方面，亦可見柳宗元視未登第之廖有方其身分為「詩人」。

²⁸ 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白居易集》，卷16，頁349。

²⁹ 柳宗元：〈送詩人廖有方序〉，《全唐文》，卷579，頁5849。

³⁰ 《全唐文》存廖有方文一首，並於其小傳稱：「有方，交州人，元和十一年進士，改名游卿，官校書郎」。見《全唐文》，卷713，頁7323。《全唐詩》存廖有方詩一首，小傳文字與《全唐文》相同。

廖有方此時已取得貢生（鄉貢進士）身分，然尚未登第，因為《柳宗元集》中尚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一文，文中稱「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³¹，在此文中，柳宗元視廖有方之身分為「貢士」，而文中稱廖為「秀才」，均符合唐人對未登第貢生之稱呼。但是在〈送詩人廖有方序〉中卻稱廖為「詩人」，蓋欲以詩人稱呼廖有方，以拉抬廖之身價，方便於舉場中得利也。

此外，楊巨源於〈寄昭應王丞〉詩亦有「天教赤縣有詩人」³²（330：3727），以詩人稱美王建，於〈和裴舍人觀田尚書出獵〉詩中，以「紫禁詩人看旆旌」（333：3741），同時稱美裴度既為中書舍人又為詩人之雙重身分。韓愈於〈送陸暢歸江南〉亦稱美陸暢「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345：3813）。由這些例子中可見，在中唐時，稱呼對方為詩人乃是一種美稱，雖然詩人身分在中唐時尚不如官職身分較受社會肯定，但從中唐士人以「詩人」一詞稱美他人，可見詩人地位之提昇。白居易於〈序洛詩〉中提到：「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簿」，亦是將「詩人」身分由「文士」之中獨立出來。³³

中唐士人，常藉詩作而得大名，如白居易（772-846）於〈與元九書〉一文中提到：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價增。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³⁴

此段文字乃出自白居易自述，與唐人或後代的筆記小說相比，自是真實可信。雖然白居易認為寫詩乃雕蟲之戲，但是由此亦可知優秀的詩作，容易流傳人口，使人成名。元稹（779-831）亦於〈白氏長慶集序〉中，提及元白二人詩作於當時流

³¹ 柳宗元：〈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全唐文》，卷575，頁5816。

³² 赤縣乃指昭應縣。昭應縣與萬年縣、長安縣當時並列為京兆府三赤縣。

³³ 白居易：〈序洛詩〉，《白居易集》，卷70，頁1474。

³⁴ 白居易：〈與元九書〉，《白居易集》，卷45，頁963-964。

行的程度：

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³⁵

元稹此段敘述，幾乎與白居易之陳述相同，元白詩句不僅於中國國內流傳，詩名亦遠傳至外國，因此元稹自豪地說「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此亦是實錄。上引兩段記載值得注意的是，元白二人均是認為自己乃是以優異的詩作取得社會聲名。

白居易於寶歷元年（825）五十四歲任蘇州刺史時，曾寫作〈吳郡詩石記〉一文，記錄年輕時仰慕韋應物之心情：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³⁶

韋應物（737-791）於貞元四年（788）至貞元六年（790）任蘇州刺史，³⁷白居易回憶年少往事，對韋應物與房孺復之詩酒風流，至年老而拳拳忻慕之意不曾稍減。當然，白居易對韋應物之景仰，與韋應物身為刺史、貴為一郡之尊有相當程度關係，但是韋、房二人所謂的「風流雅韻」形象，卻來自於二人詩、酒行爲。

³⁵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元稹集》，卷51，頁555。

³⁶ 白居易：〈吳郡詩石記〉，《白居易集》，卷68，頁1430。

³⁷ 郝賢皓：《唐刺史考》（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679-1680。又白居易於文中自言韋應物任刺史時，白居易年十四五，應為白居易誤記，事實上於韋應物任蘇州刺史時，白居易年齡應為十七八，相關考證見傅璇琮：〈韋應物繫年考證〉，《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15-316。

以擅長寫詩，能在唐朝得到良好的聲名，³⁸自然與唐朝所謂的「文學崇拜」有很大的關係，但所謂的文學崇拜，乃是唐代的一種文學風尚，擅長寫文章的，不見得擅長作詩，³⁹若文士擅詩，便會被其他士子視為詩人，而其詩人身分，亦可能凌駕其它身分之上。如僧侶若擅長寫詩，他人亦會稱讚其詩藝，而不稱美其佛法上的造詣，如于頔（？-818）作〈釋皎然杼山集序〉，文章一開始先敘述自《詩經》以降之詩歌流變，于頔認為自李陵蘇武至謝靈運後，以詩作而言，提出皎然詩藝直承謝靈運詩的看法：

梁陳以降，雖作者不絕，而五言之道，不勝其情矣。有唐吳興開士釋皎然，字清晝，即康樂十世孫。得詩人之奧旨，傳乃祖之菁華，江南詞人，莫不楷範。⁴⁰

于頔文中認為皎然為謝靈運十世孫，而能傳謝靈運詩藝之菁華。由此而論，于頔面對有僧侶、詩人雙重身分之皎然，于頔更重視皎然的詩人身分。雖然于頔於此文中，以「中祕空寂，外開方便，妙言說於文字，了心境於定惠，又釋門之慈航智炬也」等文字來重新強調皎然的僧侶身分，認為皎然之詩作，乃是開佛法之方便法門，但是于頔在文章的最末又提到「謝氏世為詩人，豈佛書所為習氣云爾」，再次強調皎然寫詩之習氣乃學佛者所欲去除的，而皎然猶不能去此習氣，委婉間接地說明于頔重視皎然之詩人身分甚於僧侶身分，而文中所謂「江南詞人，莫不楷範」，江南詞人楷範的，自然是皎然之詩藝，而非皎然於佛學上造詣。

僧侶兼有作詩才能，亦可以聞名於中唐。但寫詩本非僧侶本業，⁴¹對於中唐以

³⁸ 如姚合（779?-846?）於大和年間寄詩于華州刺史李虞仲便提到：「養生非酒病，難隱是詩名」，以詩名盛行人間而難以歸隱來稱美李虞仲。詩見姚合：〈寄華州李中丞〉（497：5641）。

³⁹ 例如劉禹錫於〈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一文中所提到的：「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便直指詩、文兼擅，是一件困難的事，而劉禹錫又認為詩乃文之精粹，如他於〈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所提到的：「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詩乃文之神妙所詠，故詩又在文之上。二文分見劉禹錫著，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19，頁232、233。

⁴⁰ 于頔：〈釋皎然杼山集序〉，《全唐文》，卷544，頁5520。

⁴¹ 佛教「八關齋戒」中有一項即是「不妄語」，白居易於〈問遠師〉一詩中提到：「葷羶停夜食，吟詠散秋懷。笑問東林老，詩應不破齋」，亦即白居易對於可否齋戒中寫詩，其實

降詩僧眾多的現象與僧人擅詩的原因，劉禹錫（772-842）提出了一套理論及說法：

梵言沙門，猶華言去欲也。能離欲則方寸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者，必依于聲律。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儵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信禪林之藹萼，而誠河之珠璣耳。初，鴻舉學詩於荊、郢間，私試竊詠，發於餘習。蓋榛楛之翠羽，弋者未之眇焉。今年至武陵，二千石始奇之，有「起予」之嘆。以方袍親絳紗者十有餘旬，由是名稍聞而藝愈變。閏八月，余步出城東門謁仁祠，而鴻舉在焉。⁴²

此文中有閏八月，故可知此文作於元和九年（814）劉禹錫任朗州司馬時，文中所謂「二千石」，乃刺史竇常。⁴³劉禹錫此文，以佛僧深習佛法，故能因定生慧，並寫出「儵然以清」、「粹然以麗」的詩作，而清、麗二字，便是歷來詩人所追求的詩作境界。文中「方袍」乃指僧衣，而「絳紗」乃指刺史所著之五品絳紅色官服。一僧侶擅詩而親近刺史，竟能「名稍聞而藝愈變」，亦可知刺史獎譽之功也。由文章敘述可知，竇常所吹噓揚譽鴻舉之處，絕非其佛法造詣，而在於鴻舉之詩藝。

中唐德宗一朝文壇盟主權德輿（761-818）於其文集中，有二篇文章專為盛唐道士吳筠（?-778）而作：〈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與〈吳尊師傳〉，⁴⁴一為文集序，一為吳筠傳記，⁴⁵吳筠為玄宗朝著名之吳、越道士，其於道教界之身分，亦可由權德輿詳述其師承可知：

存有疑慮。詩見《白居易集》，卷23，頁518。唐人趙璘所撰之《因話錄》中亦批評僧人以詩文成名之事：「元和以來，京城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號……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為緇徒設耶？」見〔唐〕趙璘撰：《因話錄》，收入《唐國史補等八種》（台北：世界書局，1991年），卷4，頁28。

⁴² 劉禹錫撰：〈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引〉，《劉禹錫集》，卷29，頁394-395。

⁴³ 竇常於元和七年至十年（812-815）任武陵郡朗州刺史。見郁賢皓：《唐刺史考》，頁2200。

⁴⁴ 二文分見《全唐文》，卷489，頁4999-4500；卷508，頁5164-5165。

⁴⁵ 《舊唐書·吳筠傳》全文幾乎全部抄自〈吳尊師傳〉，僅於傳末多「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由是為群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于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為通人所譏」一段文字，被僧侶陷害遂深詆釋氏而為通人所譏之文，不見於權德輿本文，由此亦稍可窺見五代史家之宗教傾向及好惡。〔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92，頁5129-5130。

天寶初，元纁鶴版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脗合元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邱，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元王君，王君授體元潘君，潘君授馮君，自陶君至於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為王者師。〈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吳筠，字貞節，魯中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伍流俗，乃入嵩山，依體元先生潘師正為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盡通其術。〈吳尊師傳〉

以吳筠之社會身分而言，固然為道士，權德輿序其師承，自梁朝陶弘景（456-536，諡貞白先生）以降，為第五代傳人，故吳筠應當為道教界重要人士，但是權德輿〈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中卻接著稱許吳筠：「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並且序其文集，亦先稱頌詩文而後道教論述，〈吳尊師傳〉亦云：

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常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竟終越中，文集二十卷……凡為文詞理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惟筠乎！⁴⁶

吳筠所製作讓人傳寫的篇章，由權德輿文脈看來，乃是詩歌而非道教著述，在此文中權德輿亦視李白、孔巢父之流為「詩人」，文末亦將吳筠與李、杜相提並論，亦是將吳筠視為詩人之流。雖然吳筠之社會身分為道士，但是權德輿卻以詩人身分視之，此亦可看出權德輿於道士與詩人二身分之高下取捨。權德輿本身為虔誠之佛教徒，⁴⁷亦為德宗、憲宗二朝之文章宗主，雖也寫過相關的道教人物相關文章，

⁴⁶ 《全唐文》，卷508，頁5164-5165。

⁴⁷ 權德輿有一叔祖即剃度為僧，見權德輿：〈唐故東京安國寺契微和尚塔銘並序〉云：「和尚俗姓權氏，法諱契微……姪孫德輿，以為宣父有西方聖人之說，東漢有浮圖仁祠之教……」，《全唐文》，卷501，頁5105。可知權德輿家庭有佛教背景；又〈唐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銘〉中提到：「德輿三十年前，嘗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以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遠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全唐文》，卷501，頁5104。文中聚散此生會歸彼岸之說，亦是標準之佛教思想；而權德輿於〈殤孫進馬

如〈唐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先生碑銘並序〉，⁴⁸但畢竟是少數，而三洞法師此文稱許吳善經之重點亦著眼於道教事業，如提出吳善經注解《道德經》與撰寫道教著作廿篇等，故佛教徒權德輿費心爲了吳筠寫了二篇文章，其著眼點乃是視吳筠爲詩人，並爲文以肯定其詩人身分。

以上所引雖多爲唐人爲僧侶、道士文集所作序文，文人爲他人文集作序當然稱美文章詩歌，但是，從僧侶、道士能自著文集引起文人注意，並爲之作序一事，亦可知僧侶、道人亦不甘僅以宗教身分處世，另自鑄偉詞以博得文士稱譽。

中唐文士，亦有時將官員身分與詩人身分相埒並提，如白居易曾寄詩予楊巨源（755-？），有官位與詩名相礙之稱，其〈贈楊秘書巨源〉詩題下有小注：「楊嘗有贈盧洺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白居易認爲楊巨源以詩句聞名，而白贈楊詩如下：

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鬚四海半爲兄。
貧家蘿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⁴⁹

因擅長寫詩而得到聲名，詩所稱「三朝」指的是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因此白居易以擅詩來稱美楊巨源。詩末則是白居易認爲聲名會使宦途不順遂，而以詩人身分與官吏身分對舉。楊巨源在中唐時，乃是以詩人身分聞名於政壇與士子間，如韓愈於〈送楊少尹序〉中提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⁵⁰；王建〈寄楊十二秘書〉詩亦有「新詩欲寫中朝滿，舊卷常抄外國將」（300：3413）之句；

墓誌銘並序〉中，亦記載其孫臨終之前：「大病之際，上辭尊長，下訣幼弟妹，恬然不亂，且謂其傳婢曰：『空中佛事，儼然在目，促焚香，移吾枕西嚮』，合掌而絕」，亦可見佛教爲權氏家族之共同信仰。文見《全唐文》，卷506，頁5152。又權德輿於〈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並序〉中記載「（道一）門弟子以德輿嘗遊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之……德輿往因稽首，羸獲擊蒙，飛鳥在空，莫近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眾多之請。」由此可知，權德輿受南宗馬祖道一影響亦深。文見《全唐文》，卷501，頁5106。又權德輿於〈唐大興善寺故大宏教大辯正三藏和尚影堂碣銘並序〉中提到「應公（惠應）入大師（金剛智）之室，德輿入應公之藩」，亦可知權德輿亦受密宗一派佛法，《全唐文》，卷506，頁5154。

⁴⁸ 《全唐文》，卷501，頁5107-5108。

⁴⁹ 白居易：〈贈楊秘書巨源〉，《白居易集》，卷15，頁308。

⁵⁰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4，頁274。

張籍〈題楊秘書新居〉詩中亦有「卷裏詩過一千卷，白頭新受秘書郎」(386:4352)提及楊巨源擅詩；元稹於〈敘詩寄樂天書〉一文中，自敘年少時亦經常與楊巨源往還寫詩：「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⁵¹，由此可知，楊巨源乃以詩人身分見重於當時士人。元稹在唱和白居易〈贈楊秘書巨源〉之〈和樂天贈楊秘書〉一詩中，便提及他早年與楊巨源交遊寫詩的回憶：

舊與楊郎在帝城，搜天斡地覓詩情。曾因並句甘稱小，不爲論年便喚兄。
刮骨直穿由苦鬪，夢腸翻出暫閑行。因君投贈還相和，老去那能競底名？⁵²

詩中可具體看出元稹年輕時跟隨楊巨源寫詩的過程，不僅與楊巨源作聯句詩（曾因並句），並彼此督促來增進詩藝，而楊巨源以詩人身分與元稹交遊，亦成爲元白相識前，對元稹而言最重要的詩友。此詩詩末元稹謙虛無法與白居易、楊巨源於詩名上爭勝，由此亦可見元稹對「詩名」之重視。

白居易於元和十年（815）在長安寫了〈贈楊秘書巨源〉詩後，於元和十三年（818）任江州司馬時，又寫了〈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寄賀楊巨源升任尚書郎官：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闌。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
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煙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⁵³

此詩前四句寫郎官執班及上朝景況，以稱美郎官尊貴的身分，腹聯寫楊巨源之詩藝超群與年老得志，詩末則同時稱美楊巨源於宦途及聲名俱佳，並以「詩客」來定位楊巨源之身分。由此詩之末聯，可知白居易心中認定之楊巨源，其詩人身分之位階高於官員身分，因爲「官職」與「聲名」相提並論，此處所謂的聲名，乃是以詩藝博得眾人認可之聲名，而非官銜尊貴之聲名，故末句乃稱楊巨源爲「詩客」，而「近來詩客似君稀」亦表明了白居易乃認定有特定之詩人身分群體的存在。

詩人身分，亦成爲取得世俗「聲名」之有利條件，如韓愈作〈送孟東野序〉

⁵¹ 元稹：〈敘詩寄樂天書〉，《元稹集》，卷30，頁352。

⁵² 同上註，頁232。

⁵³ 白居易：〈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白居易集》，卷17，頁369。

以稱美孟郊（751-814），便指出「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⁵⁴，以孟郊能詩，廁身於陳子昂以降之文人，此乃韓愈以詩人身分抬高孟郊之世俗價值，其銘孟郊亦云：「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⁵⁵，以說明孟郊雖無所聲名利祿之倚靠，而所出（詩作）不窮，但天不假年，無法使孟郊昌盛詩道創作更多詩歌。韓愈將孟郊之一生價值，建立在其詩藝上，亦明確地以詩人爲另一種人生典範，亦可見中唐後，於富貴顯達之主流世俗價值外，另有身爲「詩人」之價值可供努力。⁵⁶

中唐時期以降，逐漸重視詩人身分，詩人可經由詩作成名，中唐士子在面對詩人前輩或同時流輩時，亦多肯定其詩人身分之價值，這可以從很多中唐時的集序、詩序、贈序及墓誌銘中看出來。在肯定他人世俗成就時，詩作的多寡優劣，便成爲其人官爵、人格操守、文章良窳之外的另一判準。詩人身分被確立後，以身爲詩人可得名，詩之世俗價值被肯定，如此便逐漸發展出杜牧（803-852）以詩人身分尊於官爵身分的看法，如他的〈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詩，在當時便有強烈的宣示意義：

百感哀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⁵⁷

杜牧此詩作於會昌五年（845）任池州刺史時。張祜（792-853）一生爲處士，終身並無官銜，雖然令狐楚曾爲文〈進張祜詩冊表〉⁵⁸向穆宗表薦張祜，而爲元稹所沮，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張祜與徐凝爭鄉貢解元，白亦抑張申徐，使張祜不得杭州

⁵⁴ 韓愈：〈送孟東野序〉，《韓昌黎文集校注》，卷4，頁235。

⁵⁵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韓昌黎文集校注》，卷6，頁447。

⁵⁶ 其實唐人幾乎不管任何階層均有強烈追求功名利祿之心，連素稱隱者的孟浩然亦有「端居恥聖明」的想法，唐人亦幾乎人人熱中於入仕求官，其無官退隱之人，大部分都抱有懷才不遇的落寞惆悵。關於這點，宋人便與唐人有很大差異。

⁵⁷ 杜牧著，何錫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卷3，頁307。

⁵⁸ 令狐楚：〈進張祜詩冊表〉，《全唐文》，卷539，頁5476-5477。《全唐文》所錄此文，應是清代館臣轉載自《唐才子傳》中張祜條之資料。

鄉貢解元，⁵⁹故張祜因無法中舉，一生均無出身入流資格，所以無法任官，只得以處士終身。但是杜牧此詩卻將張祜身為詩人的價值，提高到一切官宦價值之上，以詩人身分凌駕於官員身分，完全確立了詩人的身分地位，並以（詩）道為詩人已身所自有，不假外求（「道非身外更何求」），而提出了「千首詩輕萬戶侯」的看法。當然，杜牧認為無人似張祜，能千首詩輕萬戶侯，亦即重視詩名甚於官爵聲名的態度，僅有張祜能辦到。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張祜重視詩人身分甚於官吏身分，此種價值觀亦得到杜牧之肯定。雖然終唐一朝，不論是文名或是詩名，都有可能成為求取功名利祿的手段，⁶⁰但是隨著寫詩可以得到愈來愈多的聲名與社會肯定，中唐之後以詩人身分自居，詩人身分亦可與唐人所重視之官吏身分相提並論。

六、結論

從本文以上的論述可知，「詩人」這個辭彙自中唐以後，大量成為某種身分的表徵，文士在詩文中以「詩人」來稱美他人，亦可知「詩人」階層自中唐後逐漸成為某種身分階層。能寫詩的士人，在社會上能得到相應的聲名，並藉此聲名，來求得相關的社會利祿，這與詩人身分被社會認可、尊崇有絕對的關係。自中唐以後，詩歌才華能謀取相當的聲名利祿，若從這個角度看來，唐詩之興盛，跟詩人身分被世俗認可，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⁵⁹ 皮日休有〈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一文，見《全唐文》，卷797，頁8359。另外有關張祜相關事蹟，請參見《唐才子傳校箋》吳在慶之相關考證。《唐才子傳校箋》，卷6，頁169-173。唯張祜事蹟非本文所討論的重點，尤其張祜與元稹、白居易、令狐楚、杜牧之間的關係，可能要從當時整體文士交誼和政治利害關係、文學觀改變的角度切入，方能有比較好的詮釋，例如張祜雖不得杭州鄉貢解元，但是得到杭州鄉貢解元之徐凝，亦無法進士登第。此乃文學與當時政局複雜交纏的結果，應作專文討論。

⁶⁰ 呂溫（772-811）的「文章拋盡愛功名」詩句，準確地說明中唐士子的心態，亦即為了功名，將文章或寫作文章之心力拋盡也在所不惜，這種觀念，將文章視為成名的手段之觀念，是中唐士子一般的想法。詩句見呂溫：〈友人邀聽歌有感〉（371：4175）。

附識：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唐詩人群與詩人地位研究〉（計畫編號：NSC98-2410-H-008-056-）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稿蒙兩位匿名評審提供寶貴修改意見，以及日後可繼續深入的研究方向，特此致謝。

引用文獻

- 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
- 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杜牧撰，何錫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 郁賢皓：《唐刺史考》，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張祜撰，尹占華校注：《張祜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
- 陳韻竹：《論賦之緣起》，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9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60年。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
-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趙磷撰：《因話錄》，收入《唐國史補等八種》，台北：世界書局，1991年。
- 劉禹錫撰，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
- 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鍾曉峰：〈論孟郊的詩人意識與自我表述〉，《淡江中文學報》，第20期，2009年6月。
-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龔鵬程：〈文學崇拜與中國社會：以唐代為例〉，《文化符號學》，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

The Concept of “Poet” and Status of Poets During the Mid-Tang Dynasty

Chen, Chia-huang*

[Abstract]

The vocabulary of “shiren” (詩人) was only referred to the authors of *The book of songs* (詩經) before Tang dynasty. But the meanings had been extended to another significance that was involved in the writers who write poems. This noticeable transformation which demonstrated the poetry writer whom were considered as “poet” to date were inferring the poets’ status changing in Mid-Tang, and therefore the title of “shiren” has been regarded as a higher rank in society from Mid-Tang period. The rising position of “shiren”, the group of poetry writers, gradually became social reputation, which recognized the value and the standings of poets. This paper serves a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word “shiren” and partially contributes to settle the concept of “shiren” during Chinese “middle ages”(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Shiren” as an identity was not an ordinary exis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is paper tries to figure the components of the idea of “shiren”, includes the changed meaning and the title referred to what kind of social status.

Keywords: Mid-Tang, poet, poetic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of poets, status of poet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